



凝眸

黄土地

——延安文学史论

万国庆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凝眸

黄土地

——延安文学史论

万国庆 著



B1285200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眸黄土地——延安文学史论/万国庆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8

ISBN 7-216-03743-X

I. 凝

II. 万…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②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6.6②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669 号

凝眸黄土地

——延安文学史论

万国庆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307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3 年 8 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定价:22.00 元

书号:ISBN 7-216-03743-X/I·32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夏中义

万国庆先生这部书,原名《回眸黄土地》,我建议换一个字:《凝眸黄土地》,味变厚。

“回眸”即“回头看”,故又称“回首”。作为肢体语言,“回首”带有随机性,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即兴动作,比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蓦然回首”,其特点是瞬间性“首身神离”,人站在原处,脑袋却突兀向后转,用日常词汇描述,近乎“思想开小差”——这当然不是对自觉的治学行为的准确陈述,“沉潜往复”、“优游涵泳”的学术思维,亟需学人长时段地全身心投入,与此相应的诗性意象,与其说是“回眸”,不如说是“凝眸”,比如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时的“终日凝眸”。

与全神贯注的“凝眸”相比,灵犀乍现的“回眸”更接近于治学过程中的直觉性发现,当实证思维濒临窘境,往往是近乎想象的直觉让学者绝处逢生。但直觉所催生的学术发现并不等于学术著述,从发现到著述,其间还横着很长、甚至很崎岖的路要走——这就不禁使我想起科学家伦琴:伦琴之伟大固然是因为他在 1895 年 11 月 8 日率先发现了 X 射线,但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竟能在其惊世发现后,仍有巨大勇气与自制力使自己镇静、清醒如故,而不急于一夜成名,为了对科学史负责,伦琴在 1895 ~ 1897 年间精心撰文三章,这三篇论文对 X 射线叙述得天衣无缝,以致嗣后 10 年谁也说不出新东西。这是韧性“凝眸”所致,绝非灵性“回眸”所为。

在这里,我想说,万国庆先生此书也是下了真功夫的,其功夫之厚重,迹近“凝眸”者的寄怀遥深,较少“回眸”者的浮光掠影。

以“黄土地”为象征的“延安文艺现象”重估,对有志于“重写文

学史”的学者来说,本是绕不开、也值得花心血去善待的课题。这就亟需一群志愿者去默默耕耘。所以说“默默”,因为不论作为口号,还是作为价值取向或学术门径,“重写文学史”之提出在本土语境已 10 年余,终究是呼唤者众,实干家寡,万国庆先生当属其中的埋头苦干者,很难得。“凝眸”层峦叠嶂的“延安文艺现象”,万国庆先生倾心于个案研究,比如对“赵树理方向”的历史追问,又如对《白毛女》版本的趋时演化的谱系辨析……这是一位不倦的勘探者,盘过一弯弯山脊,再攀一堵堵崖,但其视野又不囿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河畔塔影,胸中分明挂着一幅风云雄阔的百年中国文学版图。

假如说,百年中国文学“通史”撰写犹如泼墨大海,酣畅而浩瀚;那么,万国庆先生的“个案”研究,充其量是对海域几个行将湮没的荒岛作有创见的工笔式写生,虽无横空出世之豪迈,但因其笔触确凿而细深,将“延安文艺现象”中的若干“个案”迄今半世纪以来的沧桑流变,刻划得历历在目而又一气呵成,不仅可信,而且耐读。故我丝毫不担心此书的分量,倒是忧虑“个案”成果一俟学术含量高了,便很难不惹人眼红且手痒,尤其是当那些无意于“个案”研究的才子暨才女,却又想纵笔百年“通史”的时候。

2003 年初夏于沪上天忧草庵

目 录

第一章 延安文学: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历史选择

- (1)
- 第一节 观念重构:文艺界整风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
召开..... (3)
- 第二节 由启蒙到被启蒙:知识分子角色的转换与工
农兵文艺思潮的兴起..... (23)
- 第三节 走向“民间”:主流文学审美品格的确立 (38)

第二章 赵树理:农民忠实代言人的文化坚守

- (54)
- 第一节 乡土情结与作家文化立场的确立..... (57)
- 第二节 问题小说:战争功利主义历史环境中的艺术
选择..... (80)
- 第三节 代言与进言:无奈中的坚守与坚守时的无奈
..... (101)
- 第四节 赵树理的文化史意义..... (125)

第三章 丁玲:“五四”精神传承者的困惑、追求与

- 宿命..... (132)
- 第一节 徘徊在五四文学传统和战时文化规范之间
..... (136)
- 第二节 探索之旅——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到《夜》
..... (154)
- 第三节 纳入体制——新的小说范式的诞生..... (176)

第四节	贡献与局限	(197)
第四章	孙犁:审美浪漫主义者的精神守望	(209)
第一节	构筑精神家园:审美乌托邦的意义	(212)
第二节	战争追忆:理想主义者的伊甸园	(221)
第三节	从《村歌》到《铁木前传》:风俗画卷中的人性 悲歌	(241)
第四节	诗情与画境:小说的艺术美	(253)
第五章	《白毛女》:创作、修改、移植、接受过程所 蕴涵的文化史意义	(265)
第一节	歌剧文本的形成过程及其文化构成上的多重 性特征	(266)
第二节	歌剧文本的修改实践及所呈现的文化史意义	(281)
第三节	电影的改编与芭蕾的移植:不同时代文本所 蕴涵的特殊“精神本质”	(302)
附录一		
他有幸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		
——论中国新诗史上的艾青		(318)
一道曲折的“辙印”		
——从李準的创作之路看新中国文学坎坷前行的轨迹		(340)
在历史的追忆中构建民族精神的理想之塔		
——论 20 世纪 50 年代的长篇战争小说创作		(367)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383)
后 记		(386)

第一章 延安文学：战争文化 规范下的历史选择

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来说，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标志着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1937 年 7 月 7 日北京郊外卢沟桥的炮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战争的爆发使得国家的文化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迁移与变动，原来的文化中心上海和北京成了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成了文化的边缘地带，原来偏于一隅的重庆、昆明、桂林却逐渐汇聚了大批文化人，成了战时文化的重镇。与此同时，黄土高原上的弹丸小城延安，更是成了一批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和向往革命的知识青年心中的“圣城”，随着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由全国各地来到延安，这里成了又一个战时文化中心。三个不同的区域，各自推行着一套代表着不同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也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氛围。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版图，它还深层次地触动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战争使得革命政治力量有机会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依照自己的文化理想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整合，构建自己的文化队伍；战争使得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在成为支撑反侵略战争主要力量的同时，也成为文化所关注的重要社会阶层；战争所带来的文化人的流徙，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接近民间，并由此感受到了下层人民的苦痛和他们即将被时代唤醒的生命强力；战争使文化人开始意识到要真正有助于民族的抗战和国家的复兴，就必须从自己垒就的“象牙塔”中突围，沉入民间……总之，在多种历史因素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动和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立场的重新调整中，新文学自足的文化空间被打破了，知识分子所坚守的启蒙文化传统遭遇到了尖锐的挑

战,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文学,至此开始了一次艰难的、同时又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转折。

在这场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转折中,以延安为中心,包括华北、华中等中共统治区域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创作,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们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几十年里文学的内在精神形态和艺术形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 20 世纪中叶之后的文学发展走向,从而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成为我们考察这一世纪文化和文学发展时无法绕开的重要现象。本著作所论的“延安文学”,即是指称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特定时段(1937~1949)产生并发展于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运动及创作,不具有自然地理学意义的“延安创作”涵义。

“延安文学”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是战争文化规范下历史所做出的一种文学选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在这个行政区域内,实行了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封建政权和封建意识形态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被压迫被奴役的下层农民在新政权的支持下开始挺起了腰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开始建设,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一区域萌芽并迅速生长。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在战争环境中萌芽并生长的,新的文化建设也始终处在战争环境中,自 1937 至 1949 年的 12 年间,先是长达 8 年的抗日战争,后是将近 4 年的国内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得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建设无不打上了战争的印记。“延安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与长达 12 年的战争息息相关的。战争要求把一切都纳入军事轨道,动员起一切资源为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反侵略战争和阶级解放战争催发着人们对英雄的渴望与期待,推动着作家们改变自己的审美选

择,战争为文学灌注进一种英雄气概和群体精神,战争规范着文学的想象空间。战争时期的政治需要,还促使政权决策层不断地加强着对文化资源的控制。总之,所有这些,不仅使得文学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文化观念发生嬗变,而且还影响着文学生产的组织方式和文学的传播方式。简而言之,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战争文化强有力的直接制约着文学的发展走向。处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的延安文学,自然就带有了与其他时代的文学不尽相同的若干特征。今天,认真地考察“延安文学”生长发育的历史语境,探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战时文论建构和延安文人的精神历史,在此基础上思考“延安文学”创作思潮的精神特质和形式构成,对于我们思考和认识中国新文学史上若干重大课题,疏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流向,都是很有裨益的。

第一节 观念重构:文艺界整风与延安 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自1938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大批的爱国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来到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根据地的心脏延安。据统计,从1938年起到1943年,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各类青年知识分子达4万人之多。^①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是作家、诗人、艺术家、评论家和爱好文学的青年,他们中有些人早在左联时期就已成名,有些则是具有文艺天赋怀着对文艺美好憧憬的年青人。但不管是哪种人,他们都是把延安当成自己的“家”,当成他们梦想中的“天国”的。走向延安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走向革命,走向抗日救亡的战场,在他们充

^①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转引自朱鸿召:《兵法社会的延安文学》(博士论文),第32页,论文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1944.5.15

满青春感悟的想象中,延安更是一个能让他们摆脱压抑和束缚,实现个性充分自由的乐土。延安,寄托着他们对理想社会的全部美好想象,喜欢率性而作的艺术家们,希望能获得充分的创作自由,延安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乎成了一个可供文化人自由挥洒的乐园。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十年延安文学,最初是青春诗情的产物”,^①热烈而昂扬的情绪,充满青春梦幻般的文学想象,流淌在一个时期延安文学的字里行间,构成了初期延安文学的独特风景线。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一诗中,这样描写她心目中的延安:

七月的风,温柔的
敲窗的雨,清凉细腻。
被撩起的青春的心,
在热忱里失眠了,
有压抑不住的快乐。
听呵,这是什么声响?
洛川的河流,
延水锵锵带来了
民间欢唱。

.....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乐园。

.....

七月的延安太好了。
青春的心
燃烧着。

^① 朱鸿召:《兵法社会的延安文学》(1937~194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1页。

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①

在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习的女作家莫耶,在歌词《延安颂》中,这样描绘她心中的延安: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②

用诗篇抒写着青春梦幻般人生感受的,还有诗人何其芳。何其芳是1938年来到延安的,这位创作过《预言》和《画梦录》,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诗人,在乘着汽车沿川陕公路向陕北进发时还在心里默念着萧伯纳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③但经历了随120师去前线采访的活动,重归延安并在鲁艺任教后,何其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拥抱新生活的热情使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① 丁玲:《七月的延安》,《丁玲文集》,第三卷,352~35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莫耶:《延安颂》,转引自《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第1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许志英、邹恬:《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下卷),第6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
去建设铁路,去作飞行师,
去坐在实验室里,去写诗,
去高山上滑雪,去驾一只船颠簸在波涛上,
去北极探险,去热带搜集植物,
去带一个帐篷在星光下露宿。
去过寻常的日子,
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
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去以心发现心。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又多么芬芳。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①

确实,初期的延安文学,弥漫着的是一股充满梦幻般感觉的青春诗情,而决定这种诗情的,则是那一代文化人的精神幻想。由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城市,由独裁者统治的大后方来到延安的进步知识分子们,是把延安想象成了一个圣洁的理想社会的。他们想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实现他们以文学拥抱生活、参与历史的人生愿望。这种“圣地”情结,在延安文人心中植根很深,多年以后,狂飙社诗人柯仲平回忆起来,还充满感情地说:“1937年我到了延安,觉得延安什么都是圣洁的,每条河水和山谷,都可以写成圣洁的诗。”^②

① 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何其芳》,第175页,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见王琳著:《狂飙诗人·柯仲平传》,第41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然而,真实的延安,虽然是当时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却并不是“天国”,更不是一切都是“圣洁”的“乐土”。封建思想的残余,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官僚主义、对人的漠视,不平等,对知识分子的误解与排斥等等,以及种种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也程度不同的存在于机关、部队、学校、医院等机构中。较早的感受到“圣地”延安生活中阴暗面的文化人中,丁玲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作为担负着延安文艺界某些领导职务的她,以她关注人的彻底解放的眼光和细腻的女性感受,首先感觉到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因而,“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①有了这种认识,丁玲在1940年连续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时》两篇小说,描写了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封建思想给人带来的压抑与伤害,对女性和知识分子的命运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1941年5月丁玲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后,在她的倡导下,延安文坛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杂文创作热潮,一部分作家艺术家们,怀着“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②的良好愿望,怀着暴露身边黑暗的创作冲动,在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上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掀起了一个以暴露和批判延安社会生活中的缺陷和阴暗面为重要内容的杂文运动。1941年10月,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对“缺乏气度、缺乏耐心的倾听别人的意见”的现象作了一针见血的针砭,作者以鲁迅为例,提出要学习鲁迅先生“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的精神,

① 丁玲:《我们需要杂文》,《丁玲文集》,第四卷,383~384页。

②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58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号召：“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① 在丁玲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和《谷雨》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丁玲）、《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萧军）、《论同志的“爱”与“耐”》（萧军）、《野百合花》（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王实味）、《还是杂文时代》（罗烽）、《嚣张录》（罗烽）、《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艾青）等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直接针对现实生活中弊端的，有些在表达对现实看法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观，有些意见比较尖锐，有些则和风细雨，今天看来，作者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尖锐地讨论了延安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和男权中心主义问题，语调峻急，见出了一位女性主义作家的胆识和敢于直言的勇气；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则针对延安生活中“‘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的现象，发出了要“尊敬”和“理解”人的呼唤。作者怀着一腔热血提出，不仅要“尊敬”“为革命，从血和铁里滚爬出来，赚得遍体创疤，仍然不倦地战斗着”的同志，而且要尊敬“在血和铁底试炼中，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而后仍然回到革命队伍来战斗”的人。^② 罗烽在他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中，则直言：“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事实常常是不如希望那么圆满的”，“若是单凭穿华丽的衣裳，而懒于洗澡，迟早那件衣裳也要肮脏起来的”，作者感慨：杂文这种“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而“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今后的《文艺》（指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本书著者注）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

① 丁玲：《我们需要杂文》，《丁玲文集》，第四卷，383～384页。

② 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599～602页。

也使人喜悦的短剑”，因为“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①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中，除了呼吁社会对作家的理解和尊重外，还较为完整地表述了作者的文艺观：“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是从精神上——即情感，感觉，思想，心理活动上——守卫他所属的民族或阶级的忠实的兵士”，“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假如医生的工作是保卫人类肉体的健康，那么，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而后者的作用则更普遍、持久、深刻。”^②与延安主要报刊陆续发表一些著名作家杂文作品几乎同时，延安一些部门的青年知识分子，还以自办墙报的形式，发表他们针砭时弊的批评类文章，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央青委办的大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在整风期间出刊的《矢与的》。《轻骑队》将自己的批评宗旨规定为“严肃、谨慎、诚恳”，即“不油腔滑调，不冷嘲热讽，不作人身攻击，不戴大帽子，负责任和自由讨论”，^③②在1941年4月至1942年4月一年时间里，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性稿件。《矢与的》办刊时间很短，仅限于1942年3月整风运动初期，但在延安有较大的影响，据说“《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

① 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585页。

②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580～582页。

③ 转引自李书磊著：《1942·走向民间》，第19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上,挂在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①可见其刊出的文章是很引人注目的。在文艺界的影响下,延安美术界也在1942年初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批评和暴露生活阴暗面的活动中。1942年2月15日起,由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在延安军人俱乐部展出,画展展出的绘画作品共70余幅,内容均为讽刺延安生活中的缺点,作者为张谔、华君武和蔡若虹三人。“讽刺画展”展出后,一时参观者极其踊跃,原定3天的展出,后来不得不到各地巡展30多天。^②

1941年到1942年上半年发生在延安的这场文艺界对现实的批判浪潮是耐人寻味的。经历了初期延安文学的“青春诗情”阶段之后,一部分文学家艺术家以杂文、讽刺画和小说等形式,批评生活中的阴暗面,并且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浪潮,首先说明了文化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激情迸发之后对生活有了冷静的、全面的认识。作为新文学的传人,将现实批判作为作品的主题,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文学的功利性,主要在改造人的灵魂方面,而创作自由的体现,恰恰表现在作家既能歌颂光明,又能揭露黑暗上。这种认识,是由作家艺术家们审美的、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但在政治利害方面的考虑压倒一切的战争年代,文艺家们的这番苦心却不为政治家们所理解,其导致的后果,是悲剧性的。

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这场杂文创作浪潮中,由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两篇文章——《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导致的一场事件,留给一部中国文艺史以永久的遗憾。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实际工作是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本与文

① 转引自李书磊著:《1942·走向民间》,第21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转引自李书磊著:《1942·走向民间》,第20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